

張伯駒傳

张恩岭 ● 编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張伯駒頭二首

襟懷

煮熟一任相

變化迫

八荒天傾心似

冰窟

改丈家衣

珠璣信手落筆一輪風趣

心空之曲折高低聲入律

降容謙隻自生香

丁巳立秋



張伯駒傳

张恩岭 • 编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张伯驹传 / 张恩岭编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360-6757-8

I. ①张… II. ①张… III. ①张伯驹 (1898~1982)
—传记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8697号

出版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秦爱珍
技术编辑：凌春梅
装帧设计：林露茜
封面书法：古之

书 名 张伯驹传
ZHANG BOJU ZHUA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8.625 1 插页
字 数 180,000 字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n.com.cn>

目 录

用心追求真实（自序）

第一章　渺渺浮生一“从碧”（1898—1925年）

一　世出名门	1
二　天资初露	7
三　解甲从商	10

第二章　文采风流佳公子（1925—1932年）

一　民国四公子	17
二　传统婚姻	26
三　才子佳人	31

第三章　十年痴情红毹梦（1927—1937年）

一　师从余叔岩	39
二　醉心表演	45
三　京剧研究	48
四　恩师知己	54

第四章 词人雅好世无多（1927—1946年）

一	吟联填词	57
二	西安办实业	62
三	结缘周汝昌	65
四	“诗钟”奇才	69
五	书画双璧	73

第五章 “法书宝绘”民族情（1927—1946年）

一	情倾《平复帖》	81
二	命悬上海滩	90
三	黄金散尽《游春图》	95
四	收藏巧遇“柳如是”	102

第六章 风云变幻一真人（1947—1956年）

一	拒当市长	109
二	接济袁克定	111
三	为“和平”奔走	115
四	布衣与元帅之交	119
五	捐八珍品	122

第七章 坎坷生涯见本色（1957—1961年）

一	打成右派	131
二	气节不改	140
三	远赴关东	148

第八章 长春“春游”铩羽归 (1962—1971年)	
一 再事收藏识“脂砚”	155
二 “春游琐谈”惹祸	161
三 创《春游词》	167
四 唱酬胡蘋秋	174
五 退职改造	178
第九章 桑榆晚景心犹壮 (1972—1976年)	
一 流落京城	187
二 愤讨说法	192
三 文史馆员	200
四 梦醒《续断词》	207
第十章 春蚕到死丝未尽 (1977—1982年)	
一 喜创韵文学会	213
二 老骥伏枥	219
三 壮志未酬	223
无尽的思念	
附一：生平简表	233
附二：本书主要参阅资料	255
后记	259

第一章 渺渺浮生一“从碧”

(1898—1925 年)

一 世出名门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正月二十二日，项城县闫楼村富豪大族张家传出一个婴儿呱呱坠地的啼声，为张家增添了喜庆的气氛。这个婴儿就是后来名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张伯驹，原名张家骐，字从碧，出生于官宦之家，早年即厕身官场，但他却看不惯上层社会的卑鄙龌龊，其字之所以取“从碧”，是否就含有向往清灵、高远、不染凡尘的意思呢？张伯驹还有别号“好好先生”、“春游主人”、“重瞳乡人”。且说这“重瞳乡人”自然与项城的地理、历史有关。张伯驹曾自书一联云：“地属魏吴分两翼，乡因舜羽号重瞳”。“地属魏吴”是指项城西周时称项国，春秋时被鲁国所灭，后属楚国，

三国时又属魏地，东魏时改为秣陵，后又改为项城县。“乡因舜羽号重瞳”自然与两位历史名人有关。舜，一名虞舜、重华，传说中的古代部落首领，据说舜的眼球里有两个瞳仁；羽是指项羽，项羽也是重瞳子，且项羽与项城更有渊源，原来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张伯驹十分崇尚舜和项羽这两位古人，且为这两位具有重瞳子的不凡之人而自豪。不言而喻，这自豪中既含有见贤思齐，也有立志成为不凡之人的远大志向。由此看来，中华民族真是一个善于命名的民族，大而至于国家，小而至于个人，都必须先行正名，而且往往是赐以嘉名，冠以美号，以祈求多寿多福，喜庆与吉祥。

张伯驹出生的项城县，地处河南省东南部，自然条件很差，因地势低洼，颍水、沙河、汾河、泥河均从境内流过注入淮河，因而，向称“泽国”。由于土地十分瘠薄，广大农民辛苦一年下来收获甚低，生活异常贫困，经常过着半饥半饱、缺吃少穿的苦日子。然而项城又是一个自然秀美的地方，历史上许多文人墨客留下过不少咏唱项城的诗作，并自叹“天然诗趣天然画，欲学维摩愧未工”，可见项城风光之迷人。

项城人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美丽而又贫穷的地方。

张伯驹的生父张锦芳，字纲庵（1872—1942年），其先世从明朝初年由山西洪洞徙项城虹桥（今秣陵镇）。经过几代人的惨淡经营，积蓄日丰。张锦芳的祖父名叫张致远，字静斋，饱读诗书，应童子试名列前茅，仕途有望。但县太爷放出风声，意在索取贿赂。张氏从来是“求仁维克己，羞趋邑宰门”的，因此便无意仕途。张锦芳父亲张瑞桢，字恩周，半生苦读，“寒窗四十载，破壁晚登龙”，50多岁才中了光绪甲午科

(1894年)乡试举人。张锦芳的母亲刘静斋，乃兵部侍郎衔、漕运总督刘永庆的胞姑母。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位老师，张锦芳就是在严谨的家教中成长的。张锦芳成年后为晚清廪生，民国二年任众议院议员、政事堂存记、道尹等职。他为人诚实谦恭，性慷慨豪爽，好济人之急，唯恐不及，从不以势欺人，深受邻里赞誉。张锦芳虽然家中挂着帅府的匾额，异常显赫，但对子女教育管束非常严格，深恐子弟家人飞扬跋扈、惹是生非。他的二儿子张家骅，在县文昌宫上学，和北街张之勤的儿子张文钰同窗。一天张家骅故意问张文钰是哪里张？文钰则有意炫耀地说是北街牌坊底下的张；文钰又问他是什么张？他说：“是牌坊顶上的张。”文钰一听，大怒，二人打了起来。当时山长（院长）很难处理：一个是河南督军张镇芳的侄儿，又是文昌宫新翻修的山主，一个是文昌宫的老山主（文昌宫是张文钰的先人张承恩捐款修的）的后代。张家骅回家后愤愤地说了此事。张锦芳听说儿子羞辱同学又打架，便严厉斥责，并随即套车带儿子到张之勤家赔情道歉。这件事情很快被邻里传为佳话。

张锦芳的诗作造诣很高，在天津和许多名人唱和颇多。著有诗集《修竹斋引玉咏》传世。其中《项城八景》颇为出色，有“珠帘雾卷朝来雨，画栋云飞夕照天”，“红雨乱飘岳寺树，绿荫密布野云亭”等句，气势不凡。但张锦芳在诗作上又很虚心。他曾两次走访与项城为邻的淮阳县名士朱飞仙，以求切磋借鉴。可朱飞仙是位不求功名，不慕权势，性格很怪的人，当时被称为书、画、诗豫东三绝。张锦芳慕名前往，第一次朱飞仙外出没见到，留下名片回来了。第二次见到时，朱飞仙正在

菜园劳动，朱见到张锦芳后也不让进屋，开口便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张锦芳说：“听说朱先生诗作得很好，想跟先生和诗。”朱飞仙问道：“你的诗属于哪一家？”张锦芳谦恭地说：“我是乱凑杂字，说不上什么家。”朱飞仙说：“你不入家，跟我和什么诗？”转身又种菜去了。张锦芳受到冷遇后，不胜感叹地说：“真清高名士也！”遂驱车而回。朱飞仙之所以这样对待张锦芳，因为他知道张锦芳是张镇芳的弟弟，是权势官宦门第，所以不屑一顾。朱飞仙的这一做法未必可取，却让人从中看到了张锦芳的人品和学风。

张伯驹的父亲张锦芳兄弟二人，其兄张镇芳（1863—1933年），字馨庵，进士出身，在清朝累官长芦盐运使，署理直隶总督，后任河南都督兼民政长。由此，张氏门庭生辉，他的宅第也就成了旗杆高竖、石狮把门，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张帅府”。张镇芳仕途上一帆风顺，但膝下却无一子，常常为此郁郁寡欢。其侄儿张伯驹的出生令他喜出望外。因为按照族规，做弟弟的头胎儿子应该过继给长房。所以，伯驹6岁时，便过继给了张镇芳。

张镇芳虽非一般人物，但在乡邻眼里，却也是一位学习勤奋刻苦，尊师重道，善待邻里的人。

张镇芳在幼儿时期，刚会



张镇芳

言语，其父母就口授《三字经》，继教《四字鉴略》。稍长，即开讲解意，使之口诵心领。他8岁入塾，孜孜攻读诗书。其父常于书斋伴读，每当张镇芳读史涉及忠孝仁爱信义之事，其父则大声呼道：“汝辈能如此，方不愧为子，无愧为人矣。”后来凡读经典的诗词文赋，其父不但危坐静听，而且对声调之抑扬顿挫，稍有含混失调者，便立即指出，对读错者严加纠正。在平时学习中，父亲还为张镇芳立了严格的学规，如闻鸡而起，默背功课。背诵时不准点灯，只准燃两根香火，让他集思静心。由此可见其父用心之良苦。张镇芳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朝夕研读经史，刻苦琢磨，学业成就，最终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考中进士，时年29岁，遂了他当官的青云之志。张镇芳成进士后任户部主事，是个六品京官，居于京都8年之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之前，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狼狈西逃。张镇芳亦微服遁出北京，因有散兵土匪拦路抢劫，便折回项城，筹好盘缠后，由河南赶赴陕西。他日夜兼程到潼关才追上銮驾，被任命为陕西司行走，效劳两宫。他陪两宫由西安回銮，东绕河南进入直隶时，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也到北京迎驾，他匍匐于圣驾所经之途，也甚得“老佛爷”欢心。正是因护驾迎驾，袁世凯和张镇芳有了相晤的机会。一个是封疆大吏权重一方，一个是进士出身熟悉宫廷官场，又有老乡之情与姻亲之谊（张镇芳的姐姐嫁给了袁世凯的二哥袁世敦），两人都感觉对政事所见略同，相谈甚洽。袁力劝张出京城外调地方，并许以到山东可任要职。张权衡时机，未予轻诺。

张镇芳因在两宫西狩途中服侍周到，回京后，被恩赏为四

品衔，仍在农曹供职。

李鸿章病死后，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即奏请调任张镇芳为直隶差委总办，天津河间兵备道，张镇芳开始腾达。后又擢升长芦盐运使（长芦是渤海边一水名，因多芦苇而名，为海盐产区。后渤海周边所产之盐泛称长芦盐或芦盐）。

张镇芳深得袁世凯的信任，除了张的姐姐是袁的嫂子，更多的是出于对张镇芳经济才干特别是理财的赏识，而不是因为简单的裙带关系，在这一点上，袁世凯还是有眼力的。袁世凯事无巨细均与他商量，同时，他还是袁家的私人账房。

张镇芳恪尽职守，剔除积弊，为国库增收银两 56 万两。这时张镇芳开始涉足实业。也就是在此期间，他还同英国大使谈判，使英国人独霸的开滦煤矿为中西合办，因此升为二品京堂。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袁世凯身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掌六镇新军，权倾朝野，遭御史等弹劾，乃自请辞去练兵大臣等八项职务。再后来又升袁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

1908 年，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后死去，清廷把袁世凯开缺赶出北京。袁逃到天津，张镇芳曾资助他一笔不小款项，还担保照顾他的家属，这样一来和老袁又算是患难之交。

张镇芳多年担任的都是些阔差使，尤其是盐运使一职更是肥得流油，那时一个县的盐政每年都有十多万两银子的进项，何况总领北方的盐运使。

1912 年农历正月十四，京、津、保陆军先后哗变，大肆抢掠，造币厂、当铺及住户之稍有资财者无一幸免。惟长芦盐运使署（时在天津城里）银库存有白银 30 万两，因张镇芳行事

谨慎而免于被抢，张镇芳竟以哗变抢掠为借口，将此项库银全数亲自解送北京，交给袁世凯作了政治资本。

1912年初，袁世凯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奏准、直隶总督陈夔龙因病乞休，以张镇芳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当月即任命张镇芳为河南都督兼民政长，张遵命到职。

张镇芳当了河南都督，但他仍然恪守家训，尊重师长，善待下人，不忘桑梓。就在他“主持”河南期间，他的启蒙老师夏云五（字轩臣，贡生），人称“夏老轩”，曾为修项城漕河上的板桥，筹不够建桥经费，在家乡人的“怂恿”下，北上开封，去找张镇芳。张镇芳听说恩师从家乡来了，赶快令门卫把大门打开，把老师迎进帅府。寒暄时张镇芳弄清了老师来意，也没言声。老轩一住几天，招待颇为周到，可他再也呆不下去了，便向张镇芳提醒：“乡亲们修板桥，要我找你，可你不长不圆，中不中，今个要说清，我好回去。”张镇芳满脸赔笑，告诉老师说，修板桥的银两已在老师来的当天就派人送回去了。我想让老师多住几天，所以一直没说透。夏老轩回项后，果然钱已送到。于是，他逢人便夸张镇芳如何尊师，热心为乡里造福。

二 天资初露

张伯驹过继给张镇芳以后，张镇芳便把张伯驹带到了天津

家中，不久，便为他延师课读。不料张伯驹聪慧异常，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朝夕诵读，过目不忘，9岁即能作诗。有太康人士，曾于清朝光绪年间任过翰林院庶吉士的王新桢，曾在《丽泽社诸家诗》一文中写道：“伯驹，纲庵（即张锦芳）之子丽轩之甥也，英年挺出，直欲过前人。若《从军行》、《天上谣》等作，激昂慷慨，魄力沈雄，有倚天拔地之概。虽老于诗者，未必能办，丽轩称其‘素有大志，诗文皆豪迈可喜’，信然哉。”可惜伯驹少年诗作未能保存下来。

张镇芳、张锦芳兄弟的家风及为人，乃至整个张家的家学渊源、人文积淀实际上已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张伯驹文人气质和爱好的成形，并在日后创造出了别有洞天的人生景象。

张伯驹读书生活之外，最大的爱好就是看戏。他第一次看的京戏是在天津的下天仙茶园，看大轴杨小楼的《金钱豹》。“亮相扔叉，威风凛凛”，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从此，天津的茶园没有他不去的，且看起戏来常常乐而忘返。就在这以观戏为无上乐趣的岁月里，一颗艺术的胚芽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潜滋暗长了。

张伯驹度过了一段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之后，于宣统三年，即1911年辛亥革命这一年，和袁世凯之四、五、六、七子同入新学书院读书。

在新学书院就读期间，张伯驹仍以超群的记忆和才学博得了老师的赞赏。他除了学习规定的国文、理科等课程外，自己还研读了《楚辞》、《宋元名家词》、《枫香阁》、《苏堂诗拾》、《清声阁词四种》。他一生酷爱诗词，就是在那时扎下的根基。到20岁时，他更是通读了《二十四史》，能熟背《古文观

止》，细说《资治通鉴》。

甲寅年（1914年），袁世凯建立了一支旨在培养军官的陆军混成模范团。由其长子袁克定亲任团长。模范团的军官入选条件很苛刻，必须从北洋各师和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张伯驹显然不符合条件。但在父亲的安排下，张伯驹于1915年18岁时破格考入了混成模范团的骑科。

然而，军营中的骑科训练十分严格，这使出身富豪之家的张伯驹很不适应。那种单调与枯燥不符合他文人的浪漫气质。军号一响，立即起床，晚灯一闭，必须入寝，这可苦了张伯驹。他常常是早上不起，晚上不睡，因过惯了读书看戏、东游西逛的闲散生活，无拘无束，所以入骑科以后，他常请假回家。

张镇芳想让儿子尽早参与政事，不仅送他到模范团学习，还利用与袁家的戚谊，寻找张伯驹与袁世凯接触的机会。1915年春节前，正值张伯驹放假在家，张镇芳便安排儿子到北京去给袁世凯拜年。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召见张伯驹。当张伯驹给袁世凯磕头时，袁世凯双手将他扶起，细细端详，看伯驹个头足有一米八，风度翩翩，举止文雅，面孔英俊。袁世凯不禁高兴地问张伯驹愿不愿意到府里（总统府）来当差？张伯驹回答说，正在模范团学习呢。袁说，好好学习，毕了业，就到我这里来。张伯驹看着得意洋洋、踌躇满志的表叔大人、当今的大总统如此礼遇自己，心里也很受用。当他回到家时，见袁所赐的礼物已经先送到了，有金丝猴皮褥子两件，狐皮、紫羔皮的皮袄各一件，书籍四包，食品四包。张伯驹自己承认，18岁的他正是眼睛长在头顶的时候，从来没有服气过谁，但经此一

事，英气顿消，似乎彻底被袁笼络住了。在他晚年所著《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有一首就是叙述此事的：“拜贺春元纪岁华，皇恩始感浩天涯。褒嘉数语消英气，赐物先人已到家。”但他并不甘心，“难道我就此进入‘牢笼’？”这个念头常常萦绕在他心头。

张伯驹在受训期间，不仅不适应，还渐生反感。他过早地目睹了官场上的尔虞我诈，这让他感到了肮脏，感到了复杂，对于官场上的趋炎附势、装腔作势，更是厌恶。

张伯驹于模范团毕业后，先到陕西督军陆建章部下任职。不久，陆建章被驱逐，张伯驹又到蚌埠倪嗣冲（安徽省督军）的安武军全军商务处任提调，后安武军改为陆军，张伯驹又任长江巡阅使署咨议。这就是张伯驹“宝马金鞭，雕冠剑佩，年少英姿，意气豪横”的青年时期。他虽身栖军旅，却心在营外，仍以观戏为趣事。

三 解甲从商

对于张伯驹思想触动最深的，还有袁世凯称帝的卑劣手段与虚伪之至，以及其父张镇芳官场上的沉浮。

张伯驹得知，袁世凯与其长子袁克定为了实行帝制已是不顾一切。各地掀起的反对帝制的斗争风起云涌，袁克定是知晓的，但他以“东宫储贰”自居，害怕时间拖下来，父称帝不成。于是心生一计，当时日本人在北京办的中文报纸《顺天时

报》，反对袁世凯称帝，而袁克定则每期另外伪造一份，言日本如何如何赞成帝制。

一天，袁世凯的三女儿给父亲去街上买花生米，包花生米之纸便是真的《顺天时报》。袁见之，才恍然大悟，以前所阅的《顺天时报》全是袁克定伪印的。他当即唤人把袁克定叫来。克定知道事已败露，忙跪下求饶。袁气愤至极。按袁家家规，子弟有过，尊长令旁人挞之。但克定已被封为“皇储”，何人敢打？只好比划了几下子了事。伯驹戏曰，宛如演一出《打龙袍》戏也。《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有一首就是记载此事的：“群言举世已滔滔，假印刊章孰捉刀？袁氏家规惩大过，一场戏演打龙袍。”他还写道：“人生短促，世事渺茫。痴者为权势名利相争夺杀伐，一部《资治通鉴》，不过成王败寇。皇帝也，总统也，执政也，大元帅也，沐猴冠带，等而视之可矣。固不止袁氏有假皇也。”张伯驹从旁观者看，是即是，非即非，不拘时，不限事，并不因为与袁氏有着同邑与戚谊的关系，隐恶扬善。

然而，张伯驹对于袁世凯的诗文，却认为还是有些文采气魄的。例如，袁世凯当年避祸洹上村，曾有《冬日即目》一诗，有句云：“数点征鸿迷处所，一行猎马急归来。”就写得极有气魄、有意境。这对他说来，感到比总统本人更能吸引他。

不媚俗，不人云亦云，一切以自己的客观感受说话，这就是张伯驹的脾气，张伯驹的性格。

至于张镇芳的宦海沉浮、荣辱毁誉，也正是与袁世凯的飞黄腾达、终归失败的命运紧紧相连，错综复杂。

1913年夏，正是张镇芳督豫期间，白朗率起义军，乘北洋